责编：曹颖新　E-mail:wenshiban@hotmail.com　Tel:010—62806236　　2015年1月5日

有所思

曾国藩为何忧虑“乏才之患”

□张晓政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道光帝去世，20岁的咸丰帝继位。像许多初登大位的年轻皇帝一样，踌躇满志的咸丰帝也渴望拥有一番作为。为此，咸丰帝郑重下诏，要求群臣大胆献策进言，“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以助圣听。与咸丰帝的热情相呼应，时任礼部右侍郎的曾国藩迅速起草进呈了一份奏章《应诏陈言疏》。

大清的“乏才之患”及其原因

在这份奏章中，曾国藩略过“行政”一项，将重点集中在了“用人”上，开宗明义地强调“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他毫不客气地指出，道光以来，官场“以畏葸为慎，以柔摩为恭”，“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守者”多而“有为者”少。如今“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所谓退缩，就是遇事推脱、不肯担当，无论大事小事动辄向上请示，自己全不担责；所谓琐屑，就是不识大体、不顾大局，一味在细节琐事上计较，在繁文缛节里作文章；所谓敷衍，就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任凭风浪起，稳坐衙门台；所谓颟顸，就是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身无长技、腹无良谋。这四种通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管理系统官僚化倾向日益严重，执政能力严重退化。对此，曾国藩充满忧虑地发出警告：“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偌大大清，亿兆人民，竟会有“乏才之患”，曾国藩是否杞人忧天了？

当然不是。此时的清王朝，已进入后期阶段。曾经盛极一时的大清最终也未能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宿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展近乎停滞，反映在人才选拔培养上亦不例外，一如曾国藩所说，“乏才之患”现实且又严峻。

选人机制的僵化。清代的人才选拔，延续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如果说这项制度在开始还曾为人才选拔及阶层流动发挥过巨大作用，而越到后期，却越成为束缚人才发展的桎梏。科举演化到明清八股取士，唯考取人、唯文取人，造成千百万读书人埋头于千古不变的儒家经典、专注于固定套路的考试作文中，或成了寻章摘句、皓首穷经的老学究，或成了凌空蹈虚、言不及义的空谈家，伴之而来的是人的创造力和社会活力的萎缩。仕途只剩科举一途，使“读书做官论”大行其世。做官须经读书，读书为了做官，读书不再是修身养性、经世致用、担当道义、传承文明的途径，而仅仅成为追逐功名富贵的敲门砖。读书观的蜕变，使得读书人这个群体逐渐失去激情和锐气，趋于没落和沉沦，加剧了“官”与“吏”两大群体的分化。由于“非科举者勿得与官”，官员基本只从进士与举人中选拔，而胥吏则主要在落第秀才或落榜考生中产生。一方面，由于所学、所考与现实全无关涉，不能想象这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们一朝授官，便能处置政务、调停纠纷、掌管钱粮，从而只好将一切委诸胥吏。另一方面，胥吏由于受到严格限制，没有升迁希望，同时又不像官员有回避、调任等约束，于是专于弄权，形成了“为吏者传袭及子孙”的局面，这就是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官吏分离、胥吏弄权，是造成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用人制度的败坏。应当说，中国古代包括清代，对官员的铨选考核，从制度上讲不可谓不完备，但事实上官员因为考课优异而优先擢升的极少，绝大多数还是依据任职年月、循资排辈得以晋升，所以才会有孙中山先生所断言，“中国向来铨选，最重资格”。这一问题到清代后期尤为严重。还在曾国藩之前，23岁的龚自珍就写下《明良论》，痛感当时由于“用人论资格”造成的“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弊害，并如曾国藩一样发出警告：长此而往，莫说办事者不足，连建言献策都将“更绝无人”。曾国藩是否看到龚自珍的议论不得而知，但晚清官场由于论资排辈而带来的官员意气消磨、激情冷却，无疑是曾国藩所无法忽视的。

育人环境的沉沦。一般来说，一个王朝在开国之初，一方面通过长期艰苦创业积累了大量人才，另一方面统治者也比较注意网罗人才、励精图治，因此往往出现名臣云集、群英荟萃的盛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了王朝后期，逐渐形成利益固化的格局，反映在政治上，表现为权力圈越来越小、越来越封闭、越来越排斥新生力量的进入，进而造成社会结构越来越板结化、阶层间流动越来越陷于停滞。许多空有满腹才华、满腔抱负的优秀人才由于考试失败、时运不济等原因，被冷冰冰地挡在体制之外。与此同时，即使有少数能够进入权力圈的新人，首先必须是最听话、最驯服的人，虽然偶尔也可能出现一两个异数，但要么被同化，要么被排挤，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官场“逆淘汰”生态对人才的扼杀。于是，就出现了人才匮乏、内部循环与阶层固化、流动不通并存的困局。

与“乏才之患”相映照的，是当时内忧重重、外患不已的严峻局面，和麻木不仁、得过且过的官场心态。尽管在曾国藩写下这份奏章的十年前，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将中国深刻卷入了近代历史，使大清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仅仅一年之后，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即将爆发，但古老庞大的帝国仿佛处于风暴眼中，虽暗流涌动而表面如常。经历了康乾盛世以及嘉庆、道光两朝将近200年的执政，所谓承平日久、政怠宦成，整个官僚阶层沉醉在一派太平的景象之中，安于现状、耽于享乐，流于平庸、陷于沉沦。正如曾国藩在疏中所说，“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狂风起于青萍之末，危机来临前，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能够深刻洞见，曾国藩无疑看到了大清这座外表堂皇的大厦内部早已朽败不堪的本质，奏章中所说“四种通病”，正是他对晚清官场弊端的集中概括与抨击。他既痛心于官场的退缩琐屑、敷衍颟顸，又忧虑于“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将如何收拾应对？

未能实现的解决之道

曾国藩意识到，困扰大清的问题很多，最突出的是人才选拔的失效，即“乏才之患”；解决问题的路径也很多，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选拔优秀人才，以改变官场风气、提振士气民心。对此，曾国藩详细阐述了解决“乏才之患”的思路：转移之道，从上上下下养成崇学好学的风气；培养之方，通过教诲、甄别、保举、超擢等办法，使有功者嘉奖，有过者责惩，循吏按部就班，英才得以破格提拔；考察之法，创造“人人建言，参互质证”的氛围，使考察官员的途径更加多样、结果更加真实。

曾国藩的这份奏章，可以说是其人才思想的最早体现。尽管随着人生经历的变迁，他对于人才培养、选拔、历练的观点，包括奏章中所说化解“乏才之患”的方法在后来都发生了极大改变，但终其一生，对人才的焦虑、渴求、培养、选拔，一直是他念兹在兹的心中大事，也是他身体力行的恒久实践。咸丰、同治年间，面对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浪潮，清军八旗及绿营全无战斗抵抗能力，陷入“乏才之患”的清政府不得不倚靠地方团练维系统治。由曾国藩统帅的湘军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武装力量，以曾国藩幕府为中心的湘系集团也迅速在晚清政治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与曾国藩同列中兴四大名臣的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均出自湘军，此外，后来设立淮军的李鸿章亦出自曾国藩幕府。湘系集团人才之盛，如当时人所说，“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巡抚曾国荃、刘蓉、郭嵩焘皆楚人也，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治、学术也”，这其中尽管有派系因素，但与曾国藩独到的识人、选人、育人、用人之道无疑更密不可分。

然而，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乾坤不自由，以一二人之力，挽大厦于将倾何其难也！不从体制上改变，人才选拔注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乏才之患”既是曾国藩一生的心病，也是他一生未能解决的遗憾，退缩、琐屑、敷衍、颟顸，也从未在腐朽破败的晚清官场中消失。据《清代野记》记载，还在曾国藩结束与太平天国的征战没多久之时，京城翰林院的一个国史纂修，竟不知太平天国在“南方大乱十余年”，向人疑惑湘淮军“为何物”，问询“天下太平，与谁战者”，感叹“奇哉奇哉！何以北方如此安静”。而从这一则荒唐轶事中，也无疑让人得以一窥晚清官场那无可救药的末世。

（上接第1版）2015年，农业部门要配合国土部门，开展好这项工作，首先从大中城市周边等重点地区开始推进。同时，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推动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加大科技创新推广力度，提升种业发展水平，做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二要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确保“舌尖上的安全”。现代农业首先是质量安全的农业。要让消费者不仅吃饱吃好，还吃得安全放心，农业部门要有这个担当。要坚持“产出来”与“管出来”两手抓、两手硬。一方面，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这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治本之道，是优化农业结构、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要继续推进园艺作物标准化生产、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和水产健康养殖，加强源头治理，规范生产过程，着力打造一大批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和农产品知名品牌。另一方面，不断强化监管，抓紧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和监测评估体系，启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完善监管机构和监管机制，加大日常执法与集中整治的力度，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三要更加注重技术创新和经营方式创新，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现代农业应该是高效农业。要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要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快选育高产稳产、优质高效新品种，推进农机农艺融合，加强农业农村人才培养，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业设施装备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培育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现在户均不到半公顷地的规模，显然难有高效益。要坚持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方向，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规范流转，特别是向种田能手流转，引导发展土地入股、土地托管等多种经营形式，提高规模效益。要提高农产品加工流通效率，推进农产品储藏、保鲜、加工，大力发展“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产地市场体系建设，支持发展直销、配送、电子商务等农产品流通业态，引领种养业品牌培育与产业升级，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转方式，调结构，提效益，增收入，要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这已为实践所证明，要把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加工、流通、农业经营性服务紧密结合，实现融合，打造农业全产业链。

四要更加注重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要坚持“保护”与“治理”并重，下决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首先是做到不欠新账，逐步使透支的农业资源、环境得到休养生息。一方面，切实加大耕地、水、草原、水域滩涂等保护力度，坚决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集约节约用地制度，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要强化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加大治土治水力度，适当降低农地开发利用强度，推广农业节本增效技术，严格管制滥用乱用农业投入品，净化、修复农产品产地环境。

五要更加注重适应市场需求和资源条件，优化调整产业结构。现代农业必须是适应市场变化、满足市场需求的产业，必须是立足资源禀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产业。要进一步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优先发展比较优势突出的产业或产品，逐步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主导产品、支柱产业和特色品牌，着力打造大宗农产品优势产业带，加快培育一批特色明显、类型多样、竞争力强的专业村镇。进一步优化种养业结构，引导农民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市场紧缺、适销对路的优质特色农产品。重点是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这是优化农业结构的主要着力点。要统筹布局北方牧区、传统农区、农牧交错带、南方草山草地四大片区，打通种养业协调发展的通道，形成粮饲兼顾、农牧结合的新型农业结构。进一步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一村一品，提升农业的生态价值、休闲价值和文化价值，着力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六次产业”。

六要更加注重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农业竞争力。我国农业已经处于全面开放的国际大环境、大市场中。推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也要有世界眼光，在全球化背景下谋划农业发展战略。要推进农业对外开放，优化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进口调控政策，适当进口国内紧缺的资源性农产品，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实现国内外资源有效配置、国内外市场统筹利用，既保障供给，又保护产业、保护农民。要着力构建农业“走出去”政策体系，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战略机遇，培育一批“走出去”大型农业企业，开发利用国外农业资源。

记者：应该说，推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农业部将遵循哪些原则？

韩长赋：你说得没错。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是系统工程、长期任务，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以科技为引领，以法治为保障，注意把握节奏和方法，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坚持市场导向，尊重经济规律。深入研究需求特点、市场走势，善于利用市场信息引导农业生产，善于通过市场流通链条带动农业生产，善于运用市场的办法指导和组织农业生产，防止因盲目跟风、搞“一窝蜂”，遭到市场惩罚、农民埋怨。

坚持从实际出发，发挥比较优势。综合考虑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优势和市场条件，加强分类研究，科学制定规划，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少一些理想化、简单化、片面性，提高工作的科学性和政策的针对性、实效性。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意愿。农民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建设农业现代化的主体，中国农民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和经营自主权，充分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政府部门重点是做好规划引导和服务、及时总结推广创新实践、创造良好市场环境，切忌越俎代庖、行政命令，坚决防止一刀切、下指标、定任务。

坚持改革创新，激发内生动力。过去我国农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靠的是改革创新。现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正在经历多年未有之变局，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更需要依靠改革创新。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积极推进制度创新，破除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中华春秋

晚清民国诗学与政治关怀

□胡淼森

“人之有诗，犹国之有史。国虽板荡，不可无史；人虽流离，不可无诗。”（沈瑜庆《题崦楼遗稿》）1840年后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间国人、文人、诗人之忧伤、苦痛、悲愤，无一不与国家困境有关。

传统诗学的政治参与

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在诗中描述用人不公、贪污贿赂、陈旧腐化、百姓负担沉重、社会矛盾加剧等现实问题。龚自珍一生沉居下聊，触民生凋敝之现实，见苛捐杂税之沉重。“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身处朱门、食取俸禄，纵身居清廉、无心贪贿，也不自觉中成为腐败“同谋”。龚自珍既不愿意做委曲求全丧失丽质的“病梅”，就只有在宦海周旋中保持童心：“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

同治光绪两朝，清政府短暂中兴，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从器物和制度层面作出改革努力。其间，陈三立、郑孝胥、陈宝琛等“以诗写忧”，由“盛则为雅颂”转为“衰则为变雅变风”，书写变乱诗句，表达时代政治剧痛深创在体的生命体验，实现对政治的深度参与。同光体诗风在甲午战争前后突变，从维护转为批判。陈宝琛写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的《感春》四首，借“落花”意象糅合典故，家国之痛，落花之时、忧患之思融合一体。同光体诗人严复、陈衍、林旭等积极参加康梁变法，林旭《值夜》一诗写在军机处值夜思虑军国大事的感受，“身锁千门心万里，清辉为照倚阑干”。变法失败，林旭就义，同光派遭沉重打击，但变革之志不灭。

辛亥革命后同光体诗学主题转向保守，怀疑、逃避与反对革命。时局纷乱，同光体命运并不“同光”。严复被拉入袁世凯称帝“筹安会”；陈宝琛和郑孝胥入宣统小朝廷充当末代帝师，后宣统傀儡满洲，郑孝胥随同前往当汉奸，陈宝琛坚持不行存名节。1916年，同光体诗人刘敬时任绵阳县知县，值护国军与北洋军激战川南，土匪乘机入城劫掠，刘敬风餐露宿，保城卫民，并写下《留别左绵》一诗：“守有何难心贵一，名虽可假胆终虚……苦我登陴三百士，风餐露宿半年余。”捍卫古典人格和诗格的最后尊严。

改革：政体与诗体的转型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曾上书光绪帝，描述当时中国“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加以贿赂昏行，暴行于上，胥吏官差，慝乱于下，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乱象纷呈的社会、残酷的现实、信仰的破碎，使得政治系统的问题变得空前尖锐和复杂。制度的漏洞、体制的僵化和官员阶层的没落，则被视为一切苦难的渊薮。

从19世纪后期开始，黄遵宪、丘逢甲、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秋瑾等在艺术内容和形式上大胆探索，开创“诗界革命”。他们大多具有维新思想，善于“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康有为语），用旧的语言形式书写新的时代内容，表达政治和民生关切。如谭嗣同以山水诗书写人格抱负，以旧形式承载新思想，还使用一些西方的新名词，如《金陵听说法诗》中“纲伦惨以嗜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嗜私德”和“巴力门”分别是英语“种姓”（Caste）和“议会”（Parliament）的音译，表达对于等级制的批判和对议会制下民主政体和民众监督的向往。其就义前留下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在生命最后时刻，写出了决绝信念和深刻思考。

1909年南社成立标志旧体诗歌的真正转型。旧诗走出风雅颂赋比兴的古典传统，与旧思想旧内容划清界限，开始记录变革，抒写情志，鼓吹革命，对革命的态度成为旧体诗的分水岭。

新生：新诗体的呐喊与嘲讽

五四以后新诗逐渐成为主流。旧的文化、语言和文学，同旧的政治制度一起，以一种割裂、断裂、阵痛方式告别历史舞台。

在五四“劳工神圣”思潮影响下，新诗人挖掘民间歌谣的艺术资源，书写关怀底层农工大众的“新悯农诗”。在郭沫若的理解中，政治即罪恶，社会即腐败。他推崇无政府主义，要不顾一切“自我改造”，“趁着我们的血液还在潮，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快把那陈腐的旧皮囊，全盘洗掉！”（《浴海》）。

鲁迅将屈原作为自觉的人格追求，在旧体诗中共引用楚辞典故二十一处：“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报载患脑膜炎戏作》）融入对腐朽政治的愤慨，寄托为国奔走，扬善除恶，振清流而去浊水，探索新生政治制度的希望。《好东西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与《公民科歌》，调侃国民党各派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群丑图”。《二十二元旦》中用“下民”口吻，对躲在“租界”里终日沉溺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统治者进行谴责和嘲讽。

“我爱英雄，还爱高山，我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1927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并实现短暂经济复兴，中国知识分子曾抱有国家主义的希望，闻一多就是其中代表。他以菊花、红烛、苦茶作为人格象征，捍卫东方的纯白与高洁。

追寻：政治家的清风雅韵

百年沧桑，伤心巨变。陈天华、徐锡麟、邹容、林觉民、喻培伦……无数青年才俊、人中龙凤，“抛却十万头颅血，要将乾坤力挽回”，以血肉之躯搏浪一击，挽救摇摇欲坠的山河，追寻梦寐以求的共和。然而蓝图总被现实嘲弄，从清帝退位到袁世凯复辟失败，从北伐统一到抗战胜利，实现共和梦、富强梦的机会不断错过，只在诗句中留下沉痛与忧伤。

辛亥元勋蔡济民少通经史、善诗文，首义之日率部火烧督署，立赫赫战功，其《书愤六律》之二“风云变幻感沧桑，拒虎谁知又进狼；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同仇或被金钱魅，异日谁怜种族亡？回忆满清渐愧死，我从何处学佯狂！”脍炙人口，成为反对独裁复辟的战斗檄文。

长期任国民党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在《中吕·山坡羊·神圣战争》中书写“兴，天定助；亡，人自取”历史定律，主张整顿吏治、有所作为，“一个蚊虫、一个苍蝇、一个老虎，只要它有害于人，监察院都要过问”。但监察院面对高层保护伞无能为力，于右任只能寄意书法，牢骚自嘲。

陈毅于戎马倥偬中书写共产主义政治理想，揭示政治清明要诀所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七古·手莫伸》更揭示出共产党人的权力观和公仆意识：“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其实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缩。”从权力监督角度找到防止公权私用、以权谋私的有效途径。

“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诗之为道，即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生活中之生活也。”（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人的本质是社会化，社会化必然要面临政治问题。晚清以降诗学中的政治关怀，可以从诸多方面给后人以启示。

